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主编

谭嗣同

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贾维 著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都将谭嗣同创办浏阳算学社，视为湖湘新学之始。浏阳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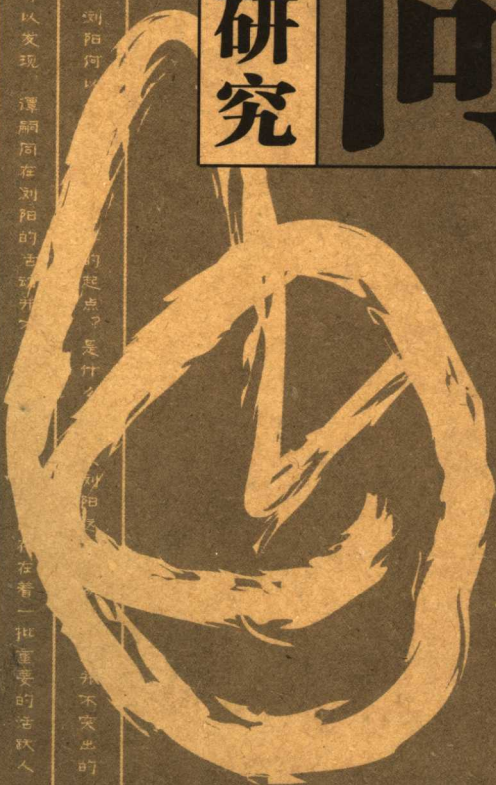
地区，突然成为引人注目的湖湘维新运动的发源地？稍加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谭嗣同在浏阳的

物，他们大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故称之为“浏阳士人群体”。谭嗣同在浏阳的维新活动，就是与这一群体共同进行的。从谭嗣同个人成长过程来说，浏

阳士人是其交往的第一个群体，他们构成了谭氏生长于其中的人文文化圈，并对谭嗣同思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谭嗣同，尤其是研究

其早期活动，决不能忽略浏阳士人群体。晚清浏阳士人群体的出现与浏阳之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浏阳之学本身又与近代湘学紧密相关。

湖南大学出版社



谭嗣同

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贾维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贾维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81053-692-3

I. 谭... II. 贾... III. ①谭嗣同(1865~1898)—人物研究 ②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B254.5
②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1226 号

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

Tansitong Yu Wanqing Shiren Jiaowang Yanjiu

贾 维 著

-
- | | | |
|-------------------------------|--------------------|--------------|
| ☐ 责任编辑 | 肖立生 | |
| ☐ 特约编辑 | 周小喜 | |
| ☐ 装帧设计 | 吴顺辉 | |
| ☐ 出版发行 | 湖南大学出版社 | |
| |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 邮码 410082 |
| | 电话 0731-8821691 | 0731-8821594 |
| ☐ 经 销 | 湖南省新华书店 | |
| ☐ 印 装 |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 | |
-

- | | | | | | |
|-----------------------------|-------------------------|--|----|-----------------------------|-------|
| ☐ 开本 | 880×1230 32 开 | ☐ 印张 | 13 | ☐ 字数 | 336 千 |
| ☐ 版次 |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 ☐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印数 | 1~4 000 册 | | | | |
| ☐ 书号 | ISBN 7-81053-692-3/B·20 | | | | |
| ☐ 定价 | 28.00 元 | | | | |
-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朱汉民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下诏全国教育改制，废书院、兴学堂，延续千年之久、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制度被废除，而其中一部分书院则改制为近代学堂。曾在中国书院史上一直极富盛名、并且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经过一段学制的变更，至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样，一所有着近千年办学历史的古老书院，终于完成其近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成为今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然而，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并没有终止，这所办学悠久的古老学府在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因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其遗址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修复原貌并对外开放，现在来此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寻访中国文化的重要目的地。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在修复的同时又逐步恢复其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功能，它已经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基地，纳入到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并获得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许许多多来岳麓书院视察、访问、考察的政界要人、学界名流，在高度赞扬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作为活的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

岳麓书院曾经有过900多年办学历史及活的文化生命。在历经种种社会变局、政治动荡之后，岳麓书院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弦歌不绝，是因为她承担着使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创新、文化积

累、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在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岳麓书院总是立身于时代的前头，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总是通过不断地著书、刻书、藏书，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累积宝贵的精神财富；总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从而完成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岳麓书院作为活的文化生命，一如既往，依旧以中华文化的创新、积累、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在这所古老的庭院中，现代学人仍在参加一次一次的学术聚会，仍在聆听一场一场的学术演讲，仍在撰写、出版一部一部的学术专著，仍在毕业一届一届的读书人。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延续在今天，而且活出了新的意义。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岳麓书院学术文库》，其主要宗旨，就是继承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继续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力。希望本文库能够传承古代书院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等功能，为现代学术文化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当然，当代学术文化，群星灿烂。我们只能根据岳麓书院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研究方向及特色，确立一些研究系列。本《文库》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湖湘文化研究系列。我们还将继续推出其他多个系列。本《文库》的作者队伍，除岳麓书院的在职教学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来此讲学的专家学者外，还包括一些在本系列的研究中有学术见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希望大家来共创今日岳麓书院的学术繁荣。

序 一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生于 1865 年（同治四年），比孙中山大一岁，比康有为小七岁。这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一年，外国列强加紧侵略，清政府被迫赔款割地，丧失主权，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希望挽救中国，振兴民族。谭嗣同怀抱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之心，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必须维新变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他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纲常伦理，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认为“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控诉“数千年三纲五常之惨祸酷毒”，号召人们奋起“冲决网罗，扫荡桎梏”。他是大无畏的战士，是中国近代的先知先觉，其思想言论在当时沉沉黑夜中放射出耀眼光芒，照亮了后人继续前进的道路。

谭嗣同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知识丰富、中西贯通的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他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学习考据注疏，“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喜爱历史兵法，骑马击剑，讲霸王经世之学。他的老家在湖南浏阳，生长在北京，几次到大西北，到过江南，游历全国各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心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后来又钻研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的学说，努力学习西方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由此形成了内容广博、中西兼采的知识体系。这一点正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特点。当时正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的时代，

谭嗣同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他大量阅读译书，如饥似渴，好学深思，努力吸收西学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可说是当时阅读译著、引用西学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仁学》这本书就是中西兼采的著作。因为当时处在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谭嗣同所学杂博而不专精，显示出不成熟的特点，这是不能苛求的。谭嗣同虽然否定荀学和程朱理学，但他并不反对孔子，认为孔子是春秋时代诸家之一，孔子和各家都有贡献，但孔子的学说被后儒所歪曲。可见他虽是很激进的思想家，但对中国的固有文化还能抱分析的态度，并不是全部否定。

谭嗣同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实干家。坐而言，起而行，言行一致。他热情投身于维新运动之中，风尘仆仆，到处奔走，与其他维新志士一起创办了许多学会（算学社、湖南强学分会、测量学会、农学会、不缠足会、南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等）、学堂（时务学堂、女学堂、致用学堂）、报纸（湘学报、矿学报、湘报），还办公司，开矿山。在短短的几年中，作了很多实事、好事。他把全部精力、时间都贡献给社会，谋求社会的进步。1898年，谭嗣同被保举晋京，参与百日维新。当顽固派发动政变时，谭嗣同毫不畏惧，拒绝出走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的狱中题壁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成为千古传诵的绝唱。谭嗣同是为救国救民、为中国的独立、繁荣、富强而流血牺牲的伟大人物，他的爱国牺牲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

对于像谭嗣同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总是会不断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在建国以来很长一个时期内，谭嗣同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很多专家学者都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谭氏就义100周年之际，已经发表的有关学术文章有200多篇，专著十余部，经中华书局第三次修订的《谭嗣同全集》也已出版发行。对于历史人物研究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一方面表明

人们对谭嗣同的热情始终未减，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学术界对此已经投入了较大的力量，谭嗣同研究早已不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是一个屡经耕耘、收获颇丰的学术园地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谭嗣同研究，就要求研究者在充分吸取、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调整研究的视角，开拓研究领域，发掘新的资料，寻找新的突破口，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任务。

贾维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的家庭与浏阳谭氏有历史渊源关系，而有志于从事谭嗣同研究。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择了《谭嗣同与晚清士人群体交往研究》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后来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成为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作者广泛搜集了谭嗣同及其师友，以及谭氏家族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信件、文稿、诗词、族谱、县志等，为此他曾三赴长沙、四处浏阳，走访了湖南、湖北、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如《瓣姜函稿》《瓣姜文稿》《刘人熙日记》《谭氏家书》等资料都未曾刊行，其中不少是在本书中首次使用的。又如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的资料，以往很少有人注意，书中也专门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作者还利用在湖南浏阳的社会关系，采访了有关的当事人，对当年谭氏家庭的状况作了一些调查了解，非常难能可贵。所以这本书史料丰富，做到了言之有据，信而有徵。

全书以谭嗣同及其师友作为研究对象，将谭氏放在与其师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以谭氏本人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其在不同时期的交往活动，探讨了这一交往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书中不仅对谭嗣同的家世、早年生活、思想发展、政治活动和学术成就作了详细叙述，而且涉及刘人熙、欧阳中鹄、唐才常、汪康年、陈三立、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宋恕、黄遵宪、熊希龄等一大批晚清著名知识分子，对他们与谭嗣同的交往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在书中还对谭嗣同与湖湘文

化的关系，以及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谭嗣同及其师友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它填补了以往谭嗣同研究的空白，为谭嗣同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

《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一书已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列入“湖湘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即将出版发行。我向贾维同志表示祝贺，并将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戴 逸

2003 年 11 月于北京

序 二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曾经唤醒过无数中国士人；他为改革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曾经激励过无数革命志士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勇猛精进。

谭嗣同牺牲一百多年以来，对于谭氏的思想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的热情倡导和大力支持，湖南省成立了谭嗣同研究会，从而使谭嗣同研究更加具有计划性和组织性。研究会成立以来，不仅与台湾仁学会联合召开了多次《仁学》研讨会，而且于 1998 年谭嗣同献身一百周年之际，召开了国际性的谭嗣同思想研讨会；与此同时，研究会还组织撰写和出版了一批研究谭氏生平和思想的著作。贾维同志的大著《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一书，就是研究会的计划课题之一。此书是贾维同志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认真修改和增补而成的。我有幸在此书出版之前，通读了全书书稿，觉得本书是近年谭嗣同研究方面一部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它填补了谭嗣同研究的一个空白，即对谭氏师友研究的缺乏。具体来说，此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突出“交往”，具体、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谭嗣同思想发展与师友影响的关系。此书不同于过去人们所撰写的“师友记”，将一个人物（事主）一生的师友交游详尽地检索出来，然后一一介绍其生平事迹及其与事主的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比较全面介绍事主的师友情况，但其不足之处，是容易造成一种平面感和静态感。此书则不然，它以谭嗣同的生平活动为经，以其师友交往（特别是与晚清士

人的交往)为纬,将谭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放在“交往”的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从而说明,谭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固然与其自身的主观努力分不开,但是与其师友,特别是与晚清士人的交往并受其影响也是分不开的。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总和”之中,师友关系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师友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进行这种动态分析时,不是孤立地分析谭嗣同与某个士人的交往,而是着重分析其与某个人才群体的交往。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在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着地域文化的差别;到了近代,随着不同地域的人们对西方文化回应的速度不同,这种差别曾一度出现扩大的趋势。而谭嗣同的一生,活动的地域非常广泛,因此在不同的地区受到不同人才群体的思想影响,也就是必然的了。本书作者将谭嗣同的一生交往活动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年阶段,即从1874年从学欧阳中鹄始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主要是与浏阳士人群体的交往;第二个时期,从1894年7月甲午战争开始至1896年离鄂北上,主要是与湘鄂维新士人群体的交往;第三个时期,是从1896年北游访学至1897年10月返湘参与新政,是与各地维新人士(主要是粤、湘、浙三大群体)的交往;第四个时期,是从1897年返湘活动到1898年9月在北京就义,主要是与湖南官绅和朝廷上层人物的交往。这种时期的划分,是符合谭嗣同一生活动的实际的。正是通过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人才群体的交往,谭嗣同的思想得以不断地与时俱进。

其二,史论结合,通过对谭氏与晚清士人之间的思想互动的分析,揭示了谭氏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贾维同志的专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他的著作是以研究历史见长,但是他又绝不是停留在单纯的史料分析和整理之上,而是善于透过谭氏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才群体的交往,揭示出谭嗣同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作者指出,谭嗣同早年师事浏阳学者欧阳中鹄和涂启先,在传统学问方面打下了

较好的基础。在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下，关心国事民瘼，讲霸王经世之学，形成了以《治言》为代表的“早期经世之学”，这是其思想学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879年，谭嗣同赴北京求学，在刘人熙的影响下，其思想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是对传统理学的部分回归，另一方面则是开始钻研船山之学，从而进入了以《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为代表的“船山哲学”时期，这是其思想学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刺激下，谭嗣同毅然弃旧迎新，完成了由旧学向新学的历史性转变，从此形成了以《兴算学议》和《报贝元徵书》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之学”，这是其思想学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北游访学和金陵宦游期间，谭嗣同从杨文会学佛，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受到深刻影响，佛学开始取代船山之学，从而出现了以《仁学》为代表的“冲决网罗”之学，这是其思想学术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在戊戌变法过程中，谭氏主张依靠开明士绅和维新人士进行变法，以达到“未有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新绅权”理论，这是其思想学术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对于本书作者关于谭嗣同思想学术发展阶段的划分和特点的概括，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却不能不承认，作者的这种分析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以成为一家之言的。

其三，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发掘并利用了许多新的资料。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浮躁心理，某些人为了追求名利，不愿意在学术研究上扎扎实实下功夫，或者停留在现成资料的抄抄引引，或者只满足于利用第二手资料，等而下之者则是剽窃别人的已有成果，其结果必然是学术成果的泛滥和肤浅。贾维同志虽然是一个青年学者，却没有沾染这种不良风气。为了写好此书，他曾三赴长沙，四处浏阳，走访了湘、鄂、宁、沪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对有关当事人进行了采访。正是由于作者这种深入的调查工作，使本书能够得以利用许多人们过去没有用过或很少用过的历史文献资料。例如，由谭嗣荣、谭传赞主编的《谭氏族谱》，就是通过谭志宏先生从谭

氏宗亲处发掘出来的。又如湖南图书馆收藏的《谭氏家书》一册，其中包括谭继升、谭继洵等人的书札 43 通，过去很少有人利用，这次却被作者用作分析谭氏家族的重要资料。再如，作者在研究浏阳士人群体时，不仅充分利用了已经刊行的《蔚庐文集》《大围山房文集》，而且充分利用了《瓣姜未刊函稿》《瓣姜未刊文稿》和《刘人熙未刊日记》。正是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作者把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也正是由于作者掌握了许多新的资料，才能得出自己的某些独到见解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以上只是我个人在阅读贾维同志的大著过程中一些粗浅感受，所罗列的几个特点也不足以概括此书的全部优点；但就是以上几个特点，也足以说明此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贾维同志踏实的学术研究作风。我衷心地希望贾维同志继续发扬这种学风，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王兴国

2003 年 12 月于长沙

（作者为湖南省谭嗣同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自序

本书以谭嗣同及其师友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将谭氏放在与其师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叙述其在不同时期的交往活动，探讨这一交往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分析其特点、影响和结果。谭嗣同与其师友的交往活动，既是谭氏本人成长、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谭嗣同及其师友，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谭嗣同的思想和活动，而且有助于探讨晚清士人和维新群体的整体面貌，这对于扩大和深化谭嗣同研究以及戊戌维新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到今天为止，谭嗣同研究已有将近 100 年的历史了。许多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表论文 200 多篇，专著 10 多部，为尔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在研究中，充分借鉴了上述成果，尤其是邓潭洲、徐义君、李喜所、邝兆江诸先生的研究成果。但以往的谭嗣同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如“在纵的方面做了不少功夫，而忽略了横的方面的研究”（陈善伟语）；“谭嗣同本身的研究较多，和谭相关的研究则较少涉及，也就是说不大关注其社会关系的考察”（李喜所语）。到目前为止，对谭嗣同与其师友关系尚无专门研究。笔者不揣浅薄，试图对此课题进行探讨，以填补以往谭嗣同研究的空白。

谭嗣同一生交游广泛，师友甚多。他自己承认平生受师友影响甚大：“居其间而握其枢者，又以友生之力为多。”纵观其一生，其师友前期以浏阳士人为主，其后逐渐扩大到湘、鄂人士，参加维新运动后又进一步扩大到京沪浙粤等地的维新人士群体。影响谭嗣同交往活动

有两个重要因素：时代条件和思想学术的变化。随着谭嗣同本人的成长，其交往活动不仅范围扩大了，而且内容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外在交往活动与内在思想演变之间的一致性，是谭氏师友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中，我们更能体会到谭嗣同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不断追求的努力。

笔者对谭嗣同师友关系的研究，没有采取传统“师友录”的静态方式，按照人物逐个记录，而是试图以谭氏本人经历为线索，用动态方式去描述其在不同时期的交往活动，努力展现其本来面貌。谭嗣同与其师友的交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不仅要研究谭嗣同，而且要研究他所交往的对象，笔者在研究中力图兼顾这两个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谭嗣同所交往的对象，往往不是以个人，而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毫无遗漏地列举谭氏的每一位师友，而是努力去把握其交往对象的群体特点和性质，以显示谭嗣同不同时期交往活动的特征。

在谭嗣同的师友中，浏阳士人群体居于十分独特的地位。浏阳是谭嗣同的故乡，在这里，浏阳之学通过浏阳士人而发生影响，浏阳士人又与谭氏宗族关系密切，谭嗣同即生活于上述三者的相互作用之中。对于谭嗣同来说，浏阳士人群体无疑具有本原性，构成其成长发展的基本背景，其时间之长和影响之大，是其他群体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基于这一原因，本文以较大篇幅研究了浏阳之学及其士人群体的起源和发展。所谓浏阳之学，是一个传统地域学术概念，它是指由浏阳籍士人所研习的传统学问，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师承关系，因而成为联系当时浏阳士人的重要纽带。晚清浏阳士人群体主要是由两代人组成的，即作为老师的刘人熙、欧阳中鹄和涂启先，以及作为学生的谭嗣同、唐才常、贝元徵和刘善涵。笔者重点探讨了“浏阳三先生”刘、欧、涂的思想和活动，指出在浏阳士人群体中，欧阳中鹄起着承上启下、联络内外的关键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浏阳之学的内容，指

出刘人熙与欧阳中鹄分别代表了浏阳之学中义理与经世两种传统，并由此对谭嗣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谭嗣同一生的交往活动，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早年阶段，即从同治十三年（1874）谭氏以欧阳中鹄为师开始，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即谭氏10岁至30岁这20年时间。这一时期，谭氏的交往活动主要限于浏阳士人群体的范围之内。

谭嗣同早年师从欧阳中鹄和涂启先，前后共达七年时间，在传统学问方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谭氏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在经世致用传统影响下，关心国事民瘼，“讲霸王经世之略”，可称之为“早期经世之学”（以《浩言》为代表），这是其思想学术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光绪十五年（1889），谭嗣同赴北京求学，“请业蔚庐”。在刘人熙的影响下，其思想出现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传统理学的部分回归，被称之为“由永嘉返濂洛”；其二是对中国古典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开始钻研船山之学，由此进入其思想学术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笔者称之为“船山哲学”时期（以《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为代表）。从谭嗣同整个思想学术发展过程看，“由永嘉返濂洛”，只是其早期思想演变的一个短暂插曲，是由早期经世之学向新的学术阶段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反映出刘人熙对青年谭嗣同的复杂影响。移居武昌后，谭嗣同开始接触西学，虽然就其思想学术整体而言，此时仍未超出旧学的范畴，但已具有日益增多的新因素。谭嗣同与在武昌的浏阳士人唐才常、刘善涵等，积极探索，互相切磋，为后来的思想转变准备了重要条件。

第二个时期，从光绪二十年七月甲午战争爆发，到丙申（1896）二月谭氏离鄂北上。这是谭嗣同与浏阳士人群体思想发生急剧转变、在湘鄂地区积极开展维新活动并开始与湘鄂维新人士交往的重要时期。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包括谭嗣同在内的浏阳士人群体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刺激，大大加速了其思想转变。他们由此认

识到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救亡图存，于是自发地行动起来，积极主张变法。浏阳士人的早期维新活动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变法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出变法方案；筹建浏阳算学馆；“湖南自立”设想的形成。浏阳变法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在湖南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使谭嗣同和浏阳士人的影响扩大到全省，在湖南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欧、谭、唐在浏阳进行的维新活动，遭到了刘人熙、贝元徵的批评，思想上的分歧促使浏阳士人群体发生第一次分化。从谭嗣同个人发展过程看，甲午战争是其思想学术的转折点。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他毅然弃旧迎新，完成了由旧学向新学的历史性转变，从此维新变法成为其思想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可称为“维新变法之学”（以《兴算学议》和《报贝元徵书》为代表），这是谭氏思想学术的第三个发展阶段。

谭嗣同在武昌进行的维新活动，使其与以汪康年、陈三立、邹代钧为代表的鄂中维新群体发生了联系。鄂中群体最初计划以武汉、上海为基地，创办“中国公会”和《译报》，但未能实现。此后鄂中群体演变为三：汪康年赴沪创办《时务报》；夏曾佑赴天津与严复等创办《国闻报》；而其主体则随陈宝箴入湘，与当地维新人士相结合，推动湖南新政的开展。在这一时期，谭嗣同曾与邹代钧商议成立湖南强学会。于是，湘中取代鄂中，成为南方维新活动的中心。从中可以看出湘、鄂维新群体的密切关系，以及鄂、湘维新运动演变的线索。

第三个时期，从谭氏丙申二月北游访学，到丁酉（1897）十月返湘参与新政。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谭嗣同广交各地维新人士，积极进行思想交流，探讨维新理论和变法策略，扩展了社会联系，开阔了视野。

通过北游访学与金陵宦游，谭嗣同的维新活动超出了湘、鄂的范围，其交往扩大到京沪浙粤的维新人士，这不仅是谭氏个人、而且是维新运动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步。在北京，谭嗣同结识了梁启超、吴铁樵、夏曾佑、吴雁舟等人，接触到新的社会思潮，思想上产生新的变化，而有创立学派的设想。到上海又与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